

# 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

黄永年 著

中华书局

# 序

先师黄永年先生以学问文章名于世，其学之博之精，为学界所宗仰。先生治学贯通文史，精于考辨，盖源自冰冻三尺的文献积累，尤其于古书版本目录之学的造诣，当世少有其匹，读其文则知其学，读其文可知其人。本集所收诸篇，虽大多曾经刊布，近年来亦有收入先生手订之多种自选文集，然专以论书之文结集成编，当更便于窥见先生几十年读书治学的生涯，而先生一生与书相伴，其富藏书久为人知，其精于赏鉴则更为人艳称，想必关心这一选题者亦广有人在，因此特以这部《古籍序跋述论集》呈献给读者。

本集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第二部分，为前代学者文士藏家笔下常见之书跋文字。需要特别说明，这些跋文相当部分从未刊布，此番结集，蒙先生哲嗣寿成襄助及藏有先生遗笔的其他门生友人的检取惠赐。此类文字虽大多较为短小，然须言之有物，很见作者之功力，故实际并不易措手。然而由于不拘泥于形式，率意挥洒，更易见作者之性情。先生题跋，颇得前代藏书名家黄丕烈之神韵，除详于文字及版本考校外，并多记得书之机缘趣事，读来可谓兴味盎然。先生留意学问，故时时在似乎不经意处，提供给读者多种知识，而此种知识，往往为今日后学所缺乏。如王士禛跋藏明抄本《左氏传说》，留有王氏当年一方蓝色用印，一般人恐怕不会留意，先生据古人守制故习，经考察，推断此当为王氏服丧期间所加盖。几年前敝校承办一重要会议，为代表准备的纪

念品上加盖有蓝印,我见后以为或不合宜,即请教先生。先生回答:“当然不妥当!”接着话头一转,以一贯的风趣说道:“关系不大,反正×××(具体办会单位名)也没有爸爸妈妈。”诸如此类的细小之处,我以为也是很值得读者多加留意的。

第三部分多为历年先生为出版古籍而撰写的序言。这些古籍不论以何种方式整理出版,多属具有重要价值的典籍。先生所撰前言皆言而有徵,即使是为出版社或他人所作,也绝非时下若干著作之所谓大家名家序,往往多空话套话之类敷衍应酬文字,且由于出自先生这样文献专家之手,更无近年来古籍出版物中时有出现的误人害人的大外行话。这些序言中,先生除系统梳理其版本渊源递嬗关系之外,还时时以点睛之笔告以学术价值所在,真正是读者阅读使用的津梁。

第四部分《版本目录研究》,则为先生论书与学问紧密结合而撰写的学术性颇强的文章。先生虽经常表示,他买书藏书是出于“好玩”,然则这一兴趣实已融入先生的治学。这部分文字最可窥见先生依据丰厚文献功力从事学术研究的特点。《西游记》作为所谓“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历来为治中国古代小说者高度重视,各类论著堪称汗牛充栋。先生自幼喜读《西游记》,几十年的熟读几可成诵。记得一次先生与门弟子闲谈,问及我等古代小说喜欢哪一部,男则多举《水浒》、《三国》,而女均谓《红楼》。先生笑曰“没出息”,随即告以“《西游记》最好看”,由此可见喜爱程度之一斑。《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是为中华书局点校出版《西游证道书》(即《西游记》)所撰之长篇前言。先生条分缕析了鲁迅、胡适、孙楷第、郑振铎等前辈诸说,借助于自己多年来读此书的深刻体会,特别是运用精熟的版本目录知识和娴习的文献考证功夫,就其成书及版本这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予以深究,其思虑之缜密,见解之精卓,实在令人赞叹。熟悉版本之学者皆知,由于版刻业的高度成熟,讲清代版本发展尤其是清本鉴别向称繁难。先生基于王国维、赵万里的版本研究而更上

层楼，在《清代版本述略》中，就这一难题首次做了条理化的讲说，非如先生之深于版本鉴定且别具慧眼者，欲臻于此谈何容易！《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虽非具体直接谈书，然实系宏观综论二十世纪传统文献之学的进展，文献之学前人亦称治书之学，因之收入亦不为不当，而此文亦足见先生高屋建瓴的器度识见和举重若轻的铺排陈叙功力。

第五部分《书林书事杂记》，或为爱书藏书的诸多书友更所乐见。先生早年即留意版籍，时过境迁，如今我等已难有前辈学人当年出入书肆的际遇，先生的访书经历，听来不无白发宫女之叹。但这些往事在先生笔下娓娓道来，不妨当作随同他老人家前去过一把神游精神故里的书瘾，依稀领略已经不再的明日黄花。而时下性喜淘书的书友，从中亦或可开阔眼界，增广见闻。由于长期随侍先生左右，而先生之藏书不仅仅是古籍珍罕之本，也包括一些民国甚或建国初期的学术出版品，而此类书籍对我辈来说，多已属难觅之物，所以尽管深知先生惜书，有时仍不得不腆着脸皮向先生张口。蒙先生开恩惠借，其书虽历数十年时光已显陈旧，然其保存之平整完好，除纸色泛黄外仍一若新书，这不能不令人惊异。先生应是前人所称之“读书种子”，其惜书爱书，恐是与生俱来，譬如说到买书之事，口头禅“我当小朋友的时候”常常脱口而出，这实与武家所云之“童子功”曲异而工同。书之于先生，盖同于有生命之灵物。他对书的干净整洁，看得异常重要，这一点可能对先生有所了解的人多少都会有印象。记得初入先生帐下，先生即传授一招：新书买回后，须以尺子压在书面近书脊处用针鼻划一细线，并言非如此则书翻看时书面会留有折痕。凡借书与我等，常随口嘱以翻看时务必仔细注意书面，尽管多年来我等已烂熟于心，但差不多次次仍不忘叮咛，于书之钟情由此可见，这恐怕就如同自家的小孩子，容不得面有伤损一般。

清人洪北江以藏书家别为五等，后人常常引据。其中之掠贩家等而下可置之不论，先生堪谓考订家、校讎家、收藏家、鉴赏家兼而一

身,而这正是这部《古籍序跋述论集》予人印象最深刻处。

与仍秉旧时代“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遗风者不同,先生授业毫无保留,生平学问,恨不得尽数传与后辈晚学。记得甫入师门初涉文献之学,面对各代各种版本,难免目迷五色,眼花缭乱。尽管先生苦口婆心一遍遍晓以在先生看来显而易见的各本特征,无奈我等愚钝不开顽劣不化,招惹先生着急,一声喝斥“念窝哈咧(眼睛瞎了)”!先生本贯江阴,操一口方音甚重的江南普通话,尽管我等素来十分敬畏先生,但冷不丁听到先生口中冒出如此地道的一句关中土语,引得我等还是忍俊不禁开怀大笑,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先生恨铁不成钢的一番苦意。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一心期于后辈能够有所成就,此书若能裨人以教益,想来先生在天之灵定会颌首乐观其效的。

先生年初不幸辞世,丧事甫毕,辛德勇师兄即倡言辑此文集。经德勇师兄数月筹划、蒐集、编辑及多方联系,现已编就即将付梓。德勇师兄以序嘱余,令我诚惶诚恐。我等习作,向为先生刊削审定且多赐序,余小子何德何能,怎堪膺此重负。三寸毫管,逾于千钧,思忖再三,略陈数语,弁诸卷首,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于万一。倘有不当,当世观书君子或鉴谅之。

贾二强 顿首谨序  
二〇〇七年五月

# 第一部分

## 自藏典籍识语

## 王士禛跋藏《左氏传说》及其他<sup>〔1〕</sup>

友人来新夏先生给齐鲁书社出版的《藏书家》第一辑写了篇《池北书库与王士禛》，介绍了这位山东籍的大诗人兼藏书家。我虽籍非山东，但自小就是王士禛诗的爱读者，还买到过他跋藏的明钞本《左氏传说》。于是也想借《藏书家》的篇幅写一些这方面的旧闻遗事。

先说这《左氏传说》。它本非僻书，南宋大学问家吕祖谦人称东莱先生者所撰，《四库全书》著录，《提要》说吕氏“生平研究《左传》，凡著三书：一曰《左传类编》，一曰《左传博议》，一即是编。其《类编》取《左氏》之文，分为十九目，久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颇无可采。《博议》则随事立义，以评其得失。是编持论与《博议》略同，而推阐更为详尽。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于《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钞录者’，其说良是”。又说“《书录解题》载是书为三十卷，此本仅二十卷，考明张萱《内阁书目》所载《传说》四册外，尚有《续说》四册，知陈氏所谓三十卷者，实兼《续说》十卷计之。今《续说》别于《永乐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云云。《提要》所说是不错的。但事实上题为《东莱左氏博议》者最受旧时读书人欢迎，传世的明代旧刻本便有好几种，有一种节选的十二卷本题为《东莱博议》的在清季更为流行，和《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同样成为村塾中的热门书。甚至通行辞书《辞源》（1988年版）、《辞海》（1979年版）的吕

〔1〕本文录自《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祖谦条都只说《博议》而不提《传说》。这当系《博议》的思路文体，最接近其后的八股文，而为明清科举中人所珍视摹仿。1942年吕诚之（思勉）师在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国文课上尝讲授及此，略见我整理的笔记、发表在1995年版《学术集林》卷三题为《古文观止评讲录》的“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条里（尽管诚之师疑《博议》为明人所伪似属过当，但对这类文字的认识透辟，实非寻常编写文学史者之能企及）。

正因为如此，这个《左氏传说》宋以后就只在《通志堂经解》里刻过一次。这《经解》是康熙时徐乾学为讨好大学士明珠的大公子词人纳兰性德，用他的名义（当时叫纳兰成德）编刻的，清季广东又翻刻过一次。但原刻的零种当年还不难得，这《左氏传说》就是我上高中时从常州的传古斋旧书铺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彼时我喜爱《左传》，所以《左传事纬》、《春秋大事表》等都曾买来翻看过。

这里要讲的王士禛跋藏《左氏传说》，是1950年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后见到的。我最初本醉心于读北大，读复旦是不得已而想混张文凭到学术界谋饭吃的。可正逢新中国第一次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分配我去上海交通大学充任政治课助教。可能是大势所趋吧，当时也没有多大勉强就服从了。要学过去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许多急用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原先的李唐文史研究只得搁在一边。但作为业馀消遣，沪上汉口路、广西路、福州路以至淮海路、常熟路的旧书店还是得空即去的。其中去得最多的是淮海路某坊一号孙实君的修文堂，福州路近河南路徐绍樵的传薪书店，以及广西路近汉口路处的温知书店。这温知书店设在楼上，得从靠马路的一长条楼梯走上去，由王兆文和一位姓魏的在实际主持（魏君的大名忘了，抗战时是南京保文堂的伙友），一大间前后房，书不少，用今天的标准多半可算得上善本。这部王士禛跋藏的《左氏传说》就放在左边架子上。其时尚在“三反”“五反”之前，标价高至旧人民币四十万（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四十元）。我是供给制待遇，自然不敢萌购买之想。幸运的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高教部有文，凡在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者一律改

发工资，我这个干了两年的助教居然一改便是每月八十四万五千元，而当时在教工食堂每顿吃好饭好菜也不过月费十五万元，大有馀钱可买线装书。加之时在“三反”“五反”以后，线装书即使是上好善本也很少有销路，于是打个对折用二十万买了下来，成为寒舍藏有的最像样的明钞本书。

它是典型的白棉纸蓝格明钞本。白口，双白鱼尾，每半叶十一行，行廿二三字至廿六七字不等，字写得不好，非名家手笔而出之钞胥所写的明钞本照例如此。二十卷订四册，外加后人所制的褐地花锦书套。册尾是王士禛手跋，作：

吕东莱《左氏传说》二十卷，钞本，二十年前得之青州，高唐王府藏书也。康熙丙寅岁，皇上诏求遗书，唯重经史。张南溟中丞方巡抚二东，使来宣索此书。是冬中丞擢刑侍北上，以元本见还。卷中殊字乙注，即中丞所雠较也。其书法似吾友朱竹垞太史之子昆田手迹，或方客中丞幕中。又渤海王太史家植《史荟》，渠丘马礼部应龙《古本周礼》，与此书同经进呈，凡三部。士禛。

下钤“官詹学士”蓝色文方印，又卷首“目录”钤“池北书库”朱文双行长方印、“济南王士禛印”白文双行长方印，“看左氏规模”前钤“王阮亭藏书记”朱文双行长方印，次册卷四前钤“石帆亭图书印”朱文双行长方印，三册卷八前钤“大司成章”朱文方印，末册卷十四前钤“国子祭酒”朱文方印，都是王士禛的印记。又每册册首空白叶上都钤“宝翰堂章”朱文方印，则似是在高唐王府时所加。另有“华阳高氏鉴藏”白文方印、“尚同校定”朱文方印、“尚同经眼”朱文双行长方印、“世异之印”白文方印、“意在三代两汉六朝之间”白文三行长方印、“郭海侯胄”白文方印、“毕阳高世异印”白文双行长方印，则是民国时高世异字尚同者所加盖。后来我买到民国三十一年印琉璃厂书店主王文进所编《文禄堂访书记》，已著录此《左氏传说》，并记下“华阳高氏鉴藏”等印，可见高氏收藏此书应在抗战之前。至于王士禛收藏后还曾入谁家，已无印记可稽。如何从文禄堂或北京谁家流入上海温知书店，

当日也未暇追询。

《文禄堂访书记》也钞录了《左氏传说》的王跋，只是把“张南溟中丞方巡抚二东”的“二东”错成了“山东”。其实此“二东”当从《诗·小雅·大东》的“大东小东”而来，或是彼时对山东的雅称，传钞时不明此等故实而妄改。这张南溟是张鹏，南溟是他的字，《清史稿》卷二〇一《疆臣年表·各省巡抚》载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辛巳张鹏山东巡抚，二十五年张鹏十月乙丑迁。王跋所说的“康熙丙寅岁”即是二十五年，这年张鹏十月乙丑迁即“是冬中丞擢刑侍北上”。又检金荣《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卷首所附《年谱》，康熙十九年迁国子监祭酒，二十三年冬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二十四年九月其父名与敕者卒。所以这《左氏传说》题跋后加盖的“宫詹学士”印记要用居丧时的蓝色。至前记王氏诸朱色印记均前此得书时所钤，“大司成”即国子祭酒之雅称。则王氏得此明高唐王府钞《左氏传说》，可能在康熙十九年任国子祭酒之后，至二十三年迁少詹事之前。

这位明高唐王，还见于王士禛的《居易录》卷一九里，说“高唐王讳某，号岱翁，工篆隶，癖嗜古书，写录多秘本，鼎革后散落市肆，纸墨精好，装潢工致。康熙乙巳，余归自扬州，一日至青州，与 园观书市中，得刘贡父《春秋权衡》、《意林》二书，亦高唐府中物。 园云：曾见岱翁篆书《入药镜》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这康熙乙巳是四年，其时自未见到此《左氏传说》，因而只提《春秋权衡》和《意林》。所说岱翁篆书《入药镜》当是墨迹，未见流传。但流传有题“皇明宗室高唐王岱翁集篆”的小篆并楷字刻本宋词《阳春白雪》，郑振铎尝得残本并为题记，今收入1998年文物出版社本《西谛书跋》，定为嘉靖间刻，并据《明史》卷一〇四《诸王世表》有“高唐悼僖王厚瘡，懿庶八子，嘉靖二十二年封，二十六年薨，无子，除”之文，谓即是其人。按“懿”者是明英宗子德庄王见潏之子德懿王祐榕，高唐王仅此厚瘡者一封，旋以无子国除，则说即此岱翁是不错的。但嘉靖二十六年岱翁之卒至明亡几及百年，此百年中高唐王府旧藏图籍何以讫告无恙，至“鼎革后”

始“散落市肆”？我对朱明藩封故事夙未究心，自不得而知。

王士禛的藏书后来多不知下落，所以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就举不出一部传世的王藏旧本书。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欣夫的补正本，也只用《文禄堂访书记》补了这个明钞《左氏传说》。《文禄堂访书记》著录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凡例就说“宋十行本群经、元纂图互注诸子等书以习见不录”，更无论明嘉靖以下的习见刻本。而王士禛的藏本除《左氏传说》外也只著录了一部宋岳珂的《玉楮诗稿》，说也是有王士禛跋的高唐王府钞本。我在温知书店买此《左氏传说》时放在一起的还有一部《啸翁老人村居以后诗》，是释显鹏撰，丁文衡选，清钱唐吴氏绣谷亭钞本，毛太纸印黑格，有吴城题跋。要讲罕见它更胜过王跋《左氏传说》，说不定还是孤本，何况钞手也雅洁胜于《左氏传说》，标价则似和《左氏传说》相同，也许还稍便宜些只标三十万光景。但我仍舍此而取《左氏传说》者，乃系迷恋王跋的缘故，而且当时精善奇秘之书实在太多，失收一些初不在意。幸好此《啸翁诗》后来卒入上海图书馆，著录进1957年该馆编印的线装《善本书目》。

我获得这《左氏传说》后，曾用通志堂本粗粗对看过。发现它如前所说虽字写得不好，且多破体甚至错误，但遇宋讳如“桓”字多缺末笔，讲到赵宋祖宗处也常空格以示恭敬，知必从宋本钞出。所以通志堂本阙失处它都完好。遗憾的是我常自恨毛笔小楷写不好，不愿在线装旧书上校改或写校语，如今老了自更无此雅兴和精力，不能如前贤那样以手校本传世了。

这里再谈我和王士禛诗的因缘，这已是抗战第二年整六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很偶然地得到一册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本《王士禛诗》，选者是哪位先生已记不起，后来得到金荣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已认为他选得并不好。但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整本的旧诗，接触《唐诗三百首》和原先村塾通行的《古唐诗合解》尚在其后，所以就对此讲神韵的王士禛诗有了特殊的兴趣。在初中二年

级时买了部后印的金荣《笺注》本，甚至星期天都带上去校园阅读。接着是搜求久负盛名的林佶写刻本王诗《精华录》，还先后买过王撰《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和惠栋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以及王氏《带经堂集》。不过《带经堂集》是残本，《训纂》是光绪时重刻本，《居易录》等也都非早印。到1957年困厄后已陆续送旧书店卖钱。只有林佶写刻的《精华录》仍有好些留在寒舍，有点故事可说。

我当初搜求林佶写刻《精华录》，是因为看了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这是当时最通行的版本备查目录，其中就说《精华录》“康熙中林佶写刊本佳”。又从《四部丛刊书录》知道所收《精华录》即用这写刊本影印，并认为该《丛刊》所据以影印的必是难得的本子。其实这林佶写刻本流传甚多，在彼时极为易得。记得50年代初，在上海合众图书馆（顾起潜廷龙先生所主持后并入上海图书馆者）附近地摊上见到一部干净的早印本，只要价人民币一元，我都不感兴趣，因为前此我已得到了好几个印本，已知其并不难得。这自然是由于王士禛当年诗名大，《精华录》成为畅销书印得特多的缘故。

不过这林佶写刻《精华录》还有原板和翻刻之分。过去公私书目和藏书题跋上都没有讲过，是我买多了比较后发觉的，近检1993年中华书局版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才知道这位精于版本的傅老先生也已觉察到此秘密，批了“此书有翻本，颇肖”的话。我回忆先后得到的林佶写刻《精华录》有七部，其中翻刻的便占了三部，这翻刻的和原板印的都有早印和晚印，我仔细比对后才明白哪是原板哪是翻板所印。当时还写了篇未能发表的小文章，大约是1949年的事情。如今手边还留有的四部中有部乾隆时苏州篆刻名家徐坚的藏本，盖满了他手刻的印章，还有几处墨笔加批，可仍是部翻刻本。翻刻这畅销书当然是其时书商图利，但也实在翻得像，恐怕徐坚此公也是当原板书买来阅读收藏的。

这里还该讲一个林佶写刻《精华录》的原板最初印本，是1960年谢刚主（国桢）先生送我的。我虽然青年时就看过刚主先生的文章，

但和他并不相识,何况彼时我早罹“扩大”之灾,只是从报纸上见到刚主先生讲清初金埴稿本《不下带编》的文章,而我正好有金埴的《巾箱说》和另一人的《听雨录》,是据八千卷楼藏钞本的旧影钞本。于是去信告诉他,稍后把书寄去送给他,他就以此《精华录》和罗振玉跋藏的旧钞本《司空表圣集》回赠。现二书仍珍藏寒舍,《精华录》卷首还装上1960年6月26日刚主先生的题记。我和刚主先生通音问时是附带表明了身份的,而刚主先生不以为嫌,和我成为忘年之交,实在是感人的。

刚主先生所赠的这部《精华录》,经朱笔圈读,且有墨笔评语多处。其中有“省钦云”等字,前人认为是乾嘉时吴省钦白华的手笔,其实只是他人传录吴省钦等人的评语。旧时在《精华录》上加批加评者极多,50年代我在上海还见到把诗人黄景仁的评语过录在金荣《笺注》本上的。这传录吴省钦等人评语的是谁已不可考知,我重视的是卷十第二十九叶《春城堆》的末句作“春城堆自忆僧施”,而其他我所见的原板印本包括《四部丛刊》影印本,都已改作“风流犹自忆僧施”,更不必说翻刻本了。足见这很可能是仅存的最早印本。所以我与贾二强同学编辑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版《清代版本图录》,就收入了这个印本。

最后还可告诉版本书的爱好者,金荣的《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原书本只十二卷,加上《补注》一卷,通行康熙五十一年金氏凤翔堂刻本,即早印者当年仍不算难得。难得的是到乾隆二年金氏又补撰补刻了一卷《渔洋山人续精华录笺注》和四叶《笺注续补》,是以后出未采入《精华录》的王氏《蚕尾后集》二百馀首中选了八十四首加以笺注而成的,行款全同康熙本《笺注》,惟字体略见肥重。我是“文革”后在上海古籍书店门市架上很偶然地以平价获得的,时在1985年或稍前。后见《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也已补了这《续笺注》本,但公私书目仍少著录。爱书者大可留心这类通常不被人们注意的好东西。

(原载《藏书家》第2辑,2000年6月)

## 跋明蓝格写本《左氏传说》

此书世无旧刻,惟文禄堂目著此明蓝格写本。提行、宋讳,悉遵旧式,字迹古雅,至可爱玩。纳兰通志堂刻未知所出,中多缺字,均藉此补正。盖此实今存世第一善本,固不独以明藩遗物、阮亭手泽乃见珍重也。辛丑清明茭青文苑题记。

## 关于《尔雅》的“威夷”及其他<sup>〔1〕</sup>

我自小就喜欢玩版本，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见到敌伪新民印书馆印行的周作人的《书房一角》，就买来翻看。由此知道郝懿行的名著《尔雅义疏》有王念孙的删节本和郝氏原本两种，原本有咸丰六年杨以增刻胡珽续刻本和通行的同治五年郝氏孙男郝联薇重刻木，删节本有最早刊刻的《皇清经解》本和道光三十年陈奂据王念孙手定本为陆建瀛校刻的木犀香馆本。并从所引用的叶德辉《郇园读书志》知道杨胡本希见，次则陆刻。其实，这陆刻也是极为希见的，因为50年代前期我常跑上海、苏州的旧书店，宋元精品虽已稀有，明清善本佳刻仍盈架充栋，而此陆刻本除了在苏州见过匆匆未买不知归于何处外，迄未再遇到。这次才承曾听过我课的辛德勇研究员的盛情，将他在北京买到的一部陆刻和我交换了别的书。而德勇之得知此陆刻之希见，好像也是我给他谈过的。

我得德勇这部陆刻是1996年1月到京开会之时，会后因重感冒在北大勺园多住了几天，就以此陆刻消遣。说实在的，由于不弄训诂之类的专业，多年来从没有把《尔雅》好好通看过，尽管当工具书也还翻过多次。这次也无非是找比较好玩的虫鱼鸟兽看一点，不料看到“释兽”的“威夷，长脊而泥”这一条，又引起我的老习惯想问个为什么了。因为这条正文下面除了有郭璞原注“泥，少才力”外，居然不见郝

〔1〕 本文录自《学苑零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懿行的疏，是本来就不曾疏呢，还是被王念孙删去了？加上对此“威夷”五十年前还有一段“因缘”即作过点考释，好奇之心不由不油然而生。

勺园客房里自无书可查，回西安后忙于正事又忘了查，转眼又是一个整年。97年元旦已过，春节将临，想偷懒看闲书以当休息，忽然想起这“威夷”的事情。从书橱里找出同治郝联薇重刻《义疏》原本一核对，原来这“威夷长脊而泥”之下是有一段郝疏的，疏文是：

邵氏《正义》引《说文》云：“委虬，虎之有角者也。”委、威声近，虬有夷音，如“周道倭迟”，《韩诗》作“周道威夷”，是威夷即委虬矣。《广韵》云：“虬，似虎有角，好行水中。”按《释文》：“泥，奴细反。”若依《广韵》“好行水中”，则泥应读如字。

王念孙把以上这些话统统删去，说明他是不相信《说文》的“委虬，虎之有角者”之说的了。我认为王念孙是正确的。因为五十年前我对此“威夷”、“委虬”作考释时，已弄清楚它只是个联绵词；也可以写成“委蛇”（《庄子·达生》）、“延维”（《山海经·海内经》）、“委维”（《山海经·大荒南经》）、“肥箇”（《山海经·西山经》）、“肥遗”（《山海经·北山经》）、“筭”（《管子·水地》）、“俞儿”（《管子·小问》）、“于儿”（《山海经·中山经》）等等，其实都由蛇这种动物的声音而来，均由蛇的形象引申为曼长而屈曲之义，这和《说文》所云“虎之有角者”是完全对不拢的（恐怕是把“委蛇”写成了“委虬”，《说文》才望文生义说什么“虎之有角”的）。所以郝懿行所引邵晋涵《尔雅正义》的这段解释是完全错误的，王念孙把它删去毫不冤枉。我这次还查了王念孙自己撰写的《广雅疏证》，在卷六上“释训”的“委蛇”条有大段解释“委蛇”、“委虬”、“透迤”、“猗移”、“委移”、“透迤”、“透蛇”、“委随”、“透随”、“裨隋”，并字异而义同的疏证，说明王念孙早就知道这是个形容曼长屈曲的联绵词，和虎不相干涉，才断然把这段郝疏删除以免贻误后人的。

有意思的可还有。我所用的同治本郝疏，是十年前在沪讲课时

老友喻若水(蘅)兄赠我的,书中有多卷经前人过录了黄季刚(侃)先生的批抹。而在这“威夷”条下,只用朱笔删去了“委、威声近,虬有夷音,如‘周道倭迟’,《韩诗》作‘周道威夷’是”二十一个字,另末句文字上稍有改动,可见他仍认为《说文》“虎之有角者”是正确的。阑上还用墨笔过录了他的批语:“威夷、委虬、綵貅皆声近,綵貅龙头,故云有角,如《广雅》说则委虬即此威夷,水产有蜺螭,亦与威夷声近也。”但我遍查《广雅》,实无“委蜺”或“威夷”之词,此或系过录滋误。用綵貅龙头来释委虬为有角之虎,自更牵强。黄氏是小学大家,所批抹的郝疏也颇有名,但在此“威夷”上却转不如其前贤王念孙,诚亦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了。

最后还得交代一下五十年前我对“委虬”所作考释的事情。是1947年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从《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里拜读了徐中舒先生的《古代狩猎图像考》。徐先生认为战国猎器中侈口而有爪的图像皆当为虎,并说:“其后此修伟之躯干,竟逐渐演化而成修长而委蜿之形,……当时或就其修长而委蜿之形,名之曰委蛇。”我认为委蛇明明是蛇的演化,不可能是虎的演化,于是写了篇长及万字的文章和徐先生商榷。文章被当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文物周刊》编者摘取了两部分分别登在第78、79期上,并加上了未经我同意的题目和不相干的插图,另一部分讲古音的则说不登了。几经搬迁,这部分退稿现不知是否尚存旧书籍乱纸丛中。其实为了弄清这古音,我曾在这年暑假里花了一个通宵啃懂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

顺便说一下,这种为了学术上的是非,向时贤前辈提点意见,作点商榷,写了文章在学术报刊上发表,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情,被商榷者固多不以为忤,发表了商榷文章像我这样的青年人也并未因之沾沾自喜起来(至少我当时还明白从整体来讲比前辈差之甚远)。记得当时我还跟好几位前辈学人作过商榷,如对陈寅恪先生的《狐臭与胡臭》一文,就利用《太平广记》的材料作驳议,剪报寄陈先生后,先生